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研究论纲

樊士博 齐卫平*

目次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概念解析	实践原则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构成样态与内在属性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构执政话语的双重挑战
(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构成样态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文化呈现与系统特征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内在属性	(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文化呈现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实践原则与现实挑战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系统特征
(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实	结语

摘要 执政话语关涉政治领导力和政治动员力,是深化新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研究的重要议题。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话语建构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彰显了治国理政的内在旨趣。执政话语是一个整体概念,由主体、客体、条件、介质等要素构成,依据不同标准,执政话语可细分为诸多话语单元,既相互联系又各有指向。在政党性质和话语的权力本质共同作用下,阶级性、社会性、法治性与批判性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四重属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建构新时代执政话语对增强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大有裨益。立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实现了刚性与柔性的统一,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知识性与通俗性的统一,思想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关键词 执政话语 话语体系 政治话语 政治传播 文化软实力

执政话语传达政策理念,关乎政党形象,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键环节。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

* 樊士博,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ZD014)与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基层党建百年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1JZD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同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话语体系”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此举表明,话语体系建设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深化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执政话语是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廓清执政话语的深刻意涵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大有裨益。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概念解析

何为话语?立足不同学科范式,学者界定不一,指涉范围亦不相同。话语不断聚合,便会形成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一个完整的表达系统,包括一系列的概念、范畴、词汇以及表述方式等。”〔3〕事实上,话语本身涉及的概念与议题非常复杂。故而,话语始终是以“体系”的面相存在。“话语体系不单纯等同于语言,它是有特定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的语言系统。”〔4〕“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是以治国理政为核心建构起来的,用来解释、描绘和引领社会现实,并集中反映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规范话语表达。”〔5〕其实,话语体系不仅是表达系统,还是话语主体向外传达的观念被他人认同,进而对集体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的实践系统。〔6〕基于既有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概念可界定为:中国共产党诠释因何执政、凭何执政、为谁执政、如何执政的表达系统与叙事体系,具有文本、声音、影像等多种表现形式。遵循此一概念,新时代执政话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首先,执政话语的主体。古语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倘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旨趣和政策意图无法向外传达,人民群众自然无从知晓。那么,政治认同的提升也就无从谈起。马克思指出:“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7〕以此类推,执政话语就是执政党及其实践的产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话语的直接主体,且具有唯一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互动中,不断向外传达理念、宗旨、愿景、规划等,它们在执政话语中常被描述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显示了执政话语的丰富性。立足中国党政体制的现实场域,人大、政府等政治组织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人大、政府构成了执政话语的间接主体,与直接主体表里相济,发挥着辅助、补充作用。这些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其行为受到执政话语的严格约束。因此,政府行政所形成的政策话语,必然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

其次,执政话语的客体,即受众。习近平高度重视执政话语的对象问题,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就曾指出:“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0页。

〔3〕姚桓、邹庆国:《论构建中国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话语体系》,载《新视野》2013年第2期,第68页。

〔4〕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5页。

〔5〕刘舒:《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创新的四个着力点》,载《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5页。

〔6〕唐爱军:《把牢解读中国制度的话语权》,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第8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42页。

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很多场合,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失语状态,怎么能使群众信服呢?”〔8〕这段引述既揭示了建构执政话语的难度,也展现了执政话语的客体复杂性。总体而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构执政话语对应的客体涉及人和组织两个层面,涵盖人民群众、党员干部、社会组织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针对不同客体讲出了许多新话语,拉近了党与不同阶层群众的距离,增强了政治认同。在面对人民群众的执政话语上,中国共产党着重强调“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9〕针对党员干部的执政话语,中国共产党越发注重使用党性话语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10〕再如,对社会组织的执政话语,中国共产党更加突出其具备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再次,执政话语的适用范围。概念在一定条件、特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一旦超出适用边界,旋即便会丧失效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概念也不例外。执政者的话语随着执政地位的确立而发展,可以说执政话语是历史概念,属于历史范畴。既是历史概念,一定是不断发展着的,必处在流变之中。故而,为避免歧义,界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就必须在时间上加以限定。因此,新时代执政话语的概念适用于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但这并不是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重而无基。恰恰相反,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新时代执政话语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从实践的内容来看,执政涉及诸多方面,因此执政话语同样涉及多个方面。简言之,执政话语的适用范围被限定在治国理政之内。

最后,执政话语的介质。话语的传播广度影响作用效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效能发挥离不开话语介质的承载。就形态来看,执政话语的承载介质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执政话语只有借助这些介质,才能影响受众。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传播介质非常复杂,难以胪列全貌,单举报纸一项,就可窥探执政话语介质的丰富性,比如党的省级委员会创办的机关报就达到30余家。近年来,受互联网传播加速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建构执政话语中同步加快了融媒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11〕可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利用传统媒介,另一方面也积极拥抱新兴媒介,以此促进执政话语介质的发展。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构成样态与内在属性

新时代执政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与治党意志的话语总和。执政话语占据当前中国话语体系的中心,能够通过内在理念辐射其他话语,在社会舆论空间中发挥引领与导向作用。

(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构成样态

执政话语内涵丰富,意蕴深刻,涉及治国理政诸多方面。依据不同标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可分成不同类别。不同类别的执政话语具有明确的指向,彰显了执政话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统一。

其一,按照执政话语的作用范围,可以将其分为针对党内的执政话语和针对党外的执政话语。针对党内的执政话语主要表现为党的建设话语,目的是塑造良好形象,夯实群众基础,确保长期执政地位不动摇。依据党的十九大所确定的党建布局,又可以将党的建设话语分成:党的政治建设

〔8〕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419页。

〔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页。

〔10〕 樊士博:《70年来中国共产党党性观的流变与发展》,载《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4期,第150页。

〔1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7页。

话语、党的思想建设话语、党的组织建设话语、党的作风建设话语、党的纪律建设话语、党的制度建设话语、反腐倡廉建设话语。遵照不同主题,每种话语之下仍可以继续细分,比如党的政治建设话语包括政治生态话语、政治规矩话语、“两个维护”话语等,这些话语既相互关联,又各有所指。事实上,正因其内部具有丰富的延展空间,执政话语始终呈现出系统性。针对党外的执政话语,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可以分成经济建设话语、政治建设话语、文化建设话语、社会建设话语、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等相互并列的话语单元。需要强调的是,面向党内的执政话语与面向党外的执政话语绝非排斥割裂,而是相互联结。譬如,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领域强调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同样强调政治建设,二者实际上是相互衔接和融合发展的关系。毋庸置疑,这种话语的内部沟通与交流机制增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整体系统性和内部生长性。

其二,按照工作事务指向分类,可以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分成宣传话语、统一战线话语、组织工作话语等单元,显示了执政党实践工作的具体方向。一直以来,分类分部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办事原则。循此逻辑,执政话语也呈现出分类分部的特点。故而,每一项具体事务形成的话语,都反映出各自的工作属性与行为特点。比如在统一战线话语中,针对不同的统战对象,中国共产党使用的话语亦不相同,这是由统战工作的“一致性与多样性”特征所决定的。再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倡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新时代民族政策话语,体现了话语的与时俱进。但在强调民族共同体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强调少数民族的独有特色,践行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主张。显然,这一话语表达显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特点。

其三,以执政话语主体所处的层级为依据,可以将执政话语分成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来看,央地关系若隐若现,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线索。得益于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也相应形成了中央层面的执政话语与地方层面的执政话语。话语即权力,而权力是有级差的,因此话语也是有等级的。组织次序决定话语等级,也就是说执政话语内部存在优先级问题,中央层面所形成的执政话语显然对地方层面的执政话语具有规制与统摄作用。举例来看,中共中央倡导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为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战略要求。紧接着,全国各地便在实践中探索并提炼出不同模式。这些模式就是中央层面执政话语的具体化与地方化,既体现了独特性,也言说了普遍性。不能否认的是,“地方”在当代中国具有多重面相。具体来看,至少有行政省、直辖市、少数民族地方以及特别行政区等类目。在行政省和直辖市一类,执政话语较为类似,表现出的普遍性较为明显。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执政话语则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治藏方略表现出与行政省不同的执政话语,原因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了少数民族地区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这显然会反映到执政话语之中。较而言之,在特别行政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表现得更为特殊。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对港、澳、台诸客体的执政话语表述更加倾向于“制度”层面的话语建构,通过阐扬国家认同,从而保证特别行政区的稳定。可见,从央地关系的视角审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具有多样化表现。正因如此,建构多元融合、因地制宜的执政话语才更具价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是指涉不同类别、不同等级、不同地域的话语系统,呈现出多圈层、相互关联的结构样态。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内在属性

探明执政话语的内在属性是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必然要求。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场域下,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内在属性既体现着政治组织本身的特点,也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从主体维度上讲,政党属性和政党角色决定执政话语的内在属性。具体而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内在属性包括四个方面:阶级性、社会性、法治性以及批判性。

一是执政话语的阶级性。马克思指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2〕}共产党人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力量，阶级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属性。因此，任何执政话语都是阶级话语。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其执政话语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13〕}这明确点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话语的阶级性与独特性。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阶级性意味着对抗性，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话语具有刚性与柔性两个截然不同的面相。从阶级内部来说，执政话语以柔性为特征，旨在说服，获取认同。对被统治阶级而言，执政话语以强硬为特征，意在约束，强调规训。具体来看，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不同向度比较

话语项目	话语特征	话语手段	话语力向	话语过程	话语效果
统治阶级	柔性	情感、法律	向心力	说服	认同
被统治阶级	刚性	暴力、法律	反推力	规训	约束

二是执政话语的社会性。恩格斯指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14〕}套用这一说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是从治国理政中产生，并和治国理政一起向前发展的。治国理政带有鲜明的社会性，这就决定了执政话语的社会性。首先，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主体具有社会性。无论是话语建构的直接主体，还是间接主体都带有鲜明的社会性。因此，由其发出的执政话语也必然带有社会性。其次，话语实践本身是一种社会活动。执政话语发生在社会场域中，吸收了丰富的社会因素。话语实践是一种政治行动，政治行动是最重要的社会性活动。故而可以说，执政话语的社会属性与生俱来。此外，执政话语是促进集体实践的先导。于是，实践也赋予了执政话语深刻的社会性。最后，执政话语的建构目的具有社会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构执政话语目的在于建设美好社会，保证“美好生活”。^{〔15〕}这样一种话语实践目标，无疑增强了执政话语的社会性。

三是执政话语的法治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三者是融会贯通的关系，也是一体多面的关系。本质上讲，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党是一种组织化的存在，为了维系内部的团结，保证对外部的示范作用，就必须坚持依法行事。在三者的互动关系中，执政话语起着桥梁与纽带作用，因为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要通过执政话语传递观念，激发人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依赖的也是执政话语。此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实践更要在自身领导的法律范围内活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在法律框架内向外传播执政话语。

四是执政话语的批判性。权力包含着竞争的内在面相，简言之有权力必然有竞争。在这个信息日益发达的世界中，话语权是最重要的权力。受权力的竞争性影响，执政话语对其他话语表现出一定的批判性。事实上，针对党内的执政话语和针对党外的执政话语都蕴含着批判性。话语的内部竞争主要是由施政方针和具体政策不同产生的差异性引起的，可以通过政党自身新陈代谢和自我革命予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1页。

〔15〕 项久雨：《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样态变革及价值引领》，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第10页。

以化解。话语的外部竞争则复杂得多,能否消弭考验着执政党的集体智慧。从政党外部来看,保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意识形态之争,首先是话语之争。^[16]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将意识形态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突出了话语的批判性,尤其是对历史虚无主义话语的批判。从国家外部看,中国政治话语的出场,将为一些国家走出政治乱局、低质民主陷阱提供中国智慧,终结西方话语的全球统治地位。^[17]总之,话语既然是一种权力,就一定会对异质话语进行批判。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实践原则与现实挑战

“言必信,行必果”是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价值旨趣。一贯注重挖掘历史资源的中国共产党,同样延续着这一传统。列宁强调:“多用行动少用言语来进行宣传。”^[18]这不是说不要话语,而是强调话语必须转变成实践,方有成效。也要看到,发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效能,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实践原则

话语转化为实践,遵循着一定的原则。从话语性质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不是文学话语,而是政治话语,这样就规定了执政话语在实践中必须遵循政治性原则。从话语起始点来看,为谁执政、靠谁执政规定了执政话语的人民性原则。若要发挥效能,就必须让受众听得懂,这就要求新时代执政话语必须具有解释性。总体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实践原则的动态逻辑,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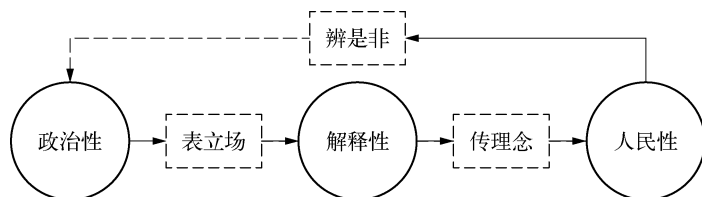


图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实践原则的动态逻辑

首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坚持政治性原则。举凡执政党首先是政治组织,“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19]故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也必须遵守政治性原则。事实上,即便是用词已经可以凸显出文本中的政策立场。^[20]政治规矩、政治生态、政治纪律等概念直接体现了执政话语的政治性。此外,在新时代执政话语中,中国共产党强调“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也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在政党阶级性语境下,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性的集中体现。正如萨托利指出的那样:“一个政治实体是意识形态的,因为社会是意识形态化的。”^[2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意识形态放到极端重要的位置,这一变化必然会反映到新时代执政

[16] 韩庆祥、鞠俊俊:《热话题与冷思考——做好意识形态“内功”:自觉主动构建“中国理论”与“中国话语”》,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第7页。

[17] 陈曙光:《政治话语的西方霸权:生成与解构》,载《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40页。

[18]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1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19页。

[20] Laver M., Benoit K., Garry J., *Extracting Policy Positions from Political Texts Using Words as Data*, 97(2)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11-331 (2003).

[21] [意] G. 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95页。

话语中。进一步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因素也会潜移默化传递给社会,进而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其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遵循解释性原则。话语缺乏可理解性,那么就是“鸡同鸭讲”。^[22]执政话语阐明党的宗旨和理念,这就意味着执政话语承担着重要的解释任务。古语云: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就是说,话语要突出中心,言之有物。执政话语有无解释性?解释性高低与否?这两个方面直接影响话语效果。也就是说,执政话语必须具有可转译的属性,要求不同受众能够听得懂话语背后传达的真实理念,进而接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信号,最终将话语表意转化为集体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采取多种举措,在话语方式、话语风格上都有转变,增强了话语感召力,有利于凝聚不同阶层的共识,厚植群众基础。

最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坚持人民性原则。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落脚点,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鲜亮底色。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必须高擎人民性旗帜。就执政话语而言,人民性原则具有辨明是非的作用,是否为了人民构成了评判话语价值高低的标尺。正如习近平所言:“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23]这一论述带有深刻的人民基因。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把人民二字镌刻在奋斗旗帜上,为了保证人民利益不懈奋斗。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凭人民而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旨在时刻提醒党员干部不忘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服务对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必须坚持人民性原则。此外,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建设事业过程中,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作用,充分释放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坚持人民性原则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创新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构执政话语的双重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势下,中国共产党建构执政话语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辩证地看,新时代建构执政话语体系既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但也面临着严峻的现实挑战。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技术,二是环境。

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勃兴给执政话语带来机遇与挑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4]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后,互联网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最大变量。习近平强调,要“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25]互联网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之大,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构建执政话语,同样无法摆脱互联网的影响。从实践来看,互联网极大改变了执政话语的传播方式,使其能够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对受众产生不间断影响。显然,在互联网环境中,执政话语的覆盖面有所上升。但是,覆盖面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话语效果的必然提升。也要看到,互联网土壤中生长的多元话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执政话语,甚至是诘难执政话语。有鉴于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认识到,“大国网络安全博弈,不单是技术博弈,还是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26]如何在多元话语中脱

[22] 胡键:《语言、话语与中国的对外传播》,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78页。

[23] 见前注[11],习近平书,第142页。

[2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0—71页。

[25] 见前注[11],习近平书,第311页。

[2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11页。

颖而出,传递政治理念,获取政治认同成为考验新时代执政话语的难题。为此,中国共产党把互联网场域中的执政话语建构提到了历史高位。在阐扬执政话语的过程中,各级党组织通过搭建融媒体平台,抢占话语阵地、织密话语网络,进而增强话语竞争力。不过,由于执政话语本身带有的严肃性,如何通过鲜活性增强话语效能,也不能忽视。

另一方面,虚无主义话语消弭执政话语。古人云: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这就是说,社会乱象的产生,话语是源头。从古今中外的经验加以审视,一个国家的颠覆,总是在甚嚣尘上的舆论中开始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建立在实践基础上,带有深刻的实在性。然而,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通过凭空捏造,恶意杜撰等方式,给执政话语的传播带来诸多“噪声”。在话语叙述上,历史虚无主义、政治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等以歪曲、捏造事实为噱头,以期博眼球,炒卖点,极大遮蔽了新时代执政话语的真实性,导致一些执政话语讲不出,传不开。由于这些虚无主义指涉的对象往往与中国共产党具有密切关联,因而就会形成竞争关系,争夺话语对象的注意力。在话语受众的猎奇心理驱使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反而处在不利位置。此外,由于多元信息的冲击,受众分辨信息真伪的能力也遭遇挑战。以上两个方面,给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建构带来了巨大挑战。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建构执政话语的方式仍需不断探索。

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文化呈现与系统特征

尽管执政话语是政治话语,但更多情况下,执政话语是以文化的形式传递给社会的。据此而言,执政话语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执政话语的政治实践最终无法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和政治生态。^[27]

(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文化呈现

基于中国共产党在当前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得出基本结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丰富、充盈了政治文化。具体说来,深植执政话语体系之中的文化逻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政话语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既是实践的产物,也推动实践发展。在开展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创造了深邃的政治文化。基于执政话语的政治性,此种政治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有效的文化秩序”。^[28]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逐步建构起清朗和谐、严肃认真的政治文化。反过来,这种政治文化又成为中国共产党拓展执政话语的重要资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29]建设文化强国,就要使执政党倡导与弘扬的文化成为引领时代的旗帜。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建设文化强国要坚持不懈地抓牢意识形态领导权。习近平强调,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30]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建构执政话语中巩固文化领导权。当然,巩固文化领导权也是建构执政话语的要旨所在。可见,二者具有同向性。

[27] 郝宇青:《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载《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8页。

[28] [法]米歇尔·克罗齐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

[29]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8页。

[3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页。

其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彰显文化自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个以语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化系统。习近平指出,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31]新时代执政话语言说的内容涉及当前中国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优势。在这三者的基础上,执政话语必然能够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从治国理政的实践来看,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在多元话语体系竞争中,谁的话语吸引人,谁就能赢得人心、获取认同。新时代的执政话语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为旨归,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

其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是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环节。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软实力成为国家竞争的主要形式之一。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吸引民众,而不是迫使他们改变。”^[32]进言之,既然能够吸引民众,就意味着能够改变民众的思想与行动。因此,软实力会在潜移默化中帮助执政党赢得政治认同。从世界范围内审视,尽管我国文化软实力在不断增强,但总体竞争力与国家地位不匹配的情势依旧突出。有鉴于此,习近平多次强调:“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33]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面前,提升文化软实力任务重大且迫在眉睫。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方案、体现中国特色。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首先便要完善新时代执政话语,增强解释力、感召力和吸引力。

(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系统特征

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特征,学者们的概括不一。执政话语是内部有序排列的整体,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而不能单从一个话语单元进行逻辑演绎。正因执政话语内部具有丰富性,无论从哪一话语单元出发都意味着对其他话语单元的忽视,进而造成话语遮蔽。从整体视角上审视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特征,大致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刚性与柔性的统一。何为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34]简言之,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既然执政话语是执掌国家政权的话语,那么就必然有统治阶级内部和统治阶级外部的区隔。在这种区隔之下,执政话语体系必然有刚性的一面,也具柔性的一面。刚性的一面表现为暴力统治,针对的是被统治阶级。柔性的一面则表现为统治阶级内部的平等关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同样是刚性与柔性的统一。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刚性话语较之以往有所缓和,更多情况是借助法律话语表现出来。得益于这种刚柔并济的特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韧性得到显著增强。

第二,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韦伯认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社会行动的两种取向。^[35]只有实现二者统一才能在稳定环境中促成积极的社会行动。任何一种执政话语都有所指向,这种指向就是话语的价值性。但是执政话语本质上还是实践话语,不能只勾画方向而不给出具体方案。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必须兼具通向实践的工具性。古语云:“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执政话语必须做到目标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一方面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页。

[32] [美]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33]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

[35]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描绘了治国理政的美好蓝图和未来方向,另一方面也给出了可行方案。举例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执政话语体系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勾画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与之相适应,执政话语也给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可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在实践中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第三,知识性与通俗性的统一。执政话语的实践代表着政治知识的常识化,政治知识往往是艰深晦涩的,因此执政话语带有普及政治知识的重任。福柯认为:“知识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36]据此而言,执政主体应该在执政话语中传递政治知识。较之以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是执政党依据环境变化给出的智力回应。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带有显著的现实特征,回应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大国这一现实性课题。在这一进程中,执政话语的知识性原则跃然纸上。知识性原则会使话语呈现出严肃特征,为了提升执政话语效能,中国共产党强调话语的通俗性。进而在传递政治理念中,实现知识性与平实性的统一。列宁就曾指出:“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37]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确是这样做的,执政话语中的用词越来越通俗,文风越来越贴日常生活,话语亲和力显著增强。这一点从习近平诸多重要讲话中可以找到直接证据,比如“撸起袖子加油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话语的使用。

第四,思想性与实践性的统一。马克思指出:“只有深信自己的信念是真理的人们,才能用温和的、打动人心的话语,而不是用尖刻的、讥讽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信念。”^[38]话语是传达思想的互动过程,也是传递思想的工具,执政话语概莫能外。^[39]从中国语境与中国实际来看,向外界传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内在要求。据此而言,执政话语必然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富含理论性与科学性的思想体系。此外,执政话语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现状的科学观察与深刻总结,对时代的观察同样体现了思想性。在思想性的基础上,执政话语表达出中国共产党的治国蓝图与经验策略。可以说,建立在对世界客观真实认知基础上的执政话语,做到了实践与认识的统一,体现了思想性。

第五,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完全摆脱过去。^[40]历史照亮未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在继承历史中更新内涵,实现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执政话语的语料,形成了内涵丰富、指涉多样的话语库。比如,在执政话语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人民话语,不同时代表述各异,但理念始终如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环境变化对执政话语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注重从历史资源中挖掘语料,又结合时代特点进行创新,丰富了执政话语的内涵,体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结 语

马克思指出:“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41]同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宗旨、方略

[36]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3页。

[37]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8页。

[39] Schmidt V. A.,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deas and Discourse*, 11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03-326 (2008).

[40] [意]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也不能离开执政话语而存在。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改变语言风格、利用多元传播介质,实现了执政话语体系的伟大变革。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42〕}这“两个大局”共同构成了当前执政话语体系创新的时代环境。面对变局,中国共产党要开展话语革命,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软实力,拓宽执政话语体系的广度。面对“全局”,中国共产党要切实发挥执政话语的凝聚作用,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积聚磅礴力量。

古语云:“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政策应当易于接受,与之相适应的话语更应当易于接受。当前,由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建构执政话语的复杂性增加。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理应采取多种方法、打通多种传播介质,开创执政话语发展的新局面。

Abstract Governing discourse is related to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i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deepening the study of proletarian parties in the new era.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uling discourse has been continuously innovated, expressing many words that have never been said before, and enhanc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CPC's policies. The ruling discourse in the new era focuses on the strategic concept and inner purpo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Governing discourse is an overall concept, consisting of subject, object, condition, medium and other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objects of discourse function, it can be divided into discourse units that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have their own directions.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e ruling dis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has four attributes: class, social, rule of law and competition. These attributes are jointly determined by the nature of the party and the power nature of the discourse. The construction of ruling discourse is of great benefit to enhancing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The ruling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presents distinctive features, realizing the unity of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the unity of value and instrumentality,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lainness, the unity of ideology and truth, the unity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Keywords Ruling Discourse, Discourse System, Discourse Powe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Soft Power

(责任编辑:蒋澄澜)

〔42〕 见前注〔11〕,习近平书,第77页。